

TAIWAN STRATEGIC REVIEW

台灣戰略研析

國際新秩序下的台灣戰略自主特刊

2025

August Special Issue No 2
Taiwan Strategy Research Association



TAIWAN STRATEGIC REVIEW

台灣戰略研析

國際新秩序下的台灣戰略自主特刊

2025

August Special Issue No 2
Taiwan Strategy Research Association



台灣戰略研析

Taiwan Strategic Review

主持人 翁明賢、副主持人 曾尹亮、助理研究員 詹祥威

作者

翁明賢、詹祥威、秦嗣葵、陳振良、曾尹亮、曾怡碩

出版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編輯組、美術編輯 施毓萱

版權聲明

本刊物之版權屬台灣戰略研究學會，未經本學會或原作者同意，請勿重製、引述或轉載

Taiwan Strategic Review

Host Wong Ming-Hsein, Deputy Zeng Yinliang, AR Tsiam Frederick Siông-Ui

Authors

Wong Ming-Hsein, Tsiam Frederick Siông-Ui, Qin Si-Qui, Chen Zhen-Liang,
Tseng Yin-Liang, Tseng Yi-Shuo

Publisher

Editorial Team of Taiwan Strategic Research Association; Layout Shih Yu-Syuan

Copyright

All rights and the copyright of this publication belongs to the Taiwan Strategy Research Association. Please do not reproduce, quote or reprin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society or the original author

台灣戰略レビュー

研究ホスト 翁明賢、副ホスト 曾尹亮、助手研究員 詹祥威

著者

翁明賢、詹祥威、秦嗣葵、陳振良、曾尹亮、曾怡碩

発行者

台湾戦略研究学会編集チーム、デザイン 施毓萱

著作権に関する声明

本出版物の著作権は台湾戦略研究学会に帰属します。学会または原著者の許可なく複製、引用、転載することは禁じられています。

國際新秩序下的台灣戰略自主特刊

1. 主編序 翁明賢
2. 「美國川普治理下的國際秩序」：建構主義的角度 翁明賢
3. 川普主義下的美歐關係：戰略依賴與戰略自主的十字路口 詹祥威
4. 美國與東亞關係：戰略聯盟 vs 戰術抵銷 秦嗣葵
5. 川普 2.0 時期美中戰略競逐下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挑戰與抉擇 陳振良
6. 美臺戰略前沿與戰術牽制：國際秩序重整下的臺灣戰略自主 曾尹亮
7. 兩岸關係的戰略自主與戰略溝通 曾怡碩

主編序

主編序

2025年初，美國第47任總統川普再度執政，宣告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進入新一輪動盪與重構。美國以「主權優先、競爭為本」為核心的新一輪外交安全戰略，迅速衝擊既有多邊機制與國際合作架構，使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秩序步入轉型關鍵期。各國在權力位移與地緣競爭深化之下，紛紛尋求制度創新、戰略彈性與自主安全的平衡點，力圖在變局中維持國家利益與區域影響力。

台灣位處印太戰略弧線的核心樞紐，在全球權力與規則再洗牌過程中，不僅是觀察者，更是利害攸關的行動者。戰略自主對台灣而言，已不僅是面對外在威脅的被動防衛，更是面對未來世界變化時能否自處、應變與創局的關鍵能力。此一主動定位，不僅關乎國家安全，也深刻連結台灣作為區域和平貢獻者的角色定位與價值實踐。

對全球格局快速重組與區域局勢升溫，台灣唯有強化自身趨勢判讀力、戰略整合力、制度韌性力與外交創新力，方能確保自身戰略定位與決策主體性，在變局中開創安全與發展並進的永續路徑。這不僅是國家自主意志的展現，更是台灣對區域和平與全球秩序的積極回應。

翁明賢

「美國川普治理下的國際秩序」：建構主義的角度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榮譽教授、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 翁明賢博士

摘要

在美國川普 2.0 時期推行「美國優先」與「讓美國再度偉大」政策，顯著衝擊以往由美國主導、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建構主義指出，國際秩序不僅由權力分配決定，更多依賴國家間互動中形成的共享觀念、身份與利益。川普政策加速從制度化多邊合作向割喉式權力政治轉變，導致國家間不信任升高，身份關係重塑。對臺灣而言，這意味必須在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主動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身份與規範，強化國防科技與經濟自主，並借助多元國際合作形成新的安全與供應鏈架構。臺灣戰略自主不僅是自給自足，更是積極建構與盟友及國際社會間的多層次共識，透過身份認同與利益調整提升國際地位，應對美中戰略對峙與全球秩序重塑帶來的挑戰。

關鍵字：川普治理、國際秩序、建構主義

一、前言

近期國際關係學界討論一個從二次大戰後一個主導事局發展的課題：美國「霸權治理」的終結？「美國世紀」是否結束了？全球戰略格局是否真正轉向「多極化」？上述問題根源都是從 2017 年川普第一任開始推動「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到 2025 年第二任基於「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戰略主軸下的結果。

事實上，2017 年慕尼黑國際安全研討會主題為：「三後世界」的出現：「後真相、後秩序、後西方」（Post-Truth, Post-Order, Post-West）¹，就是論述川普上台以來，西方國家整體民主發展受到極右勢力、資訊媒體誤導，美國放棄多邊主義，不再擔任世界警察角色，讓長期以來所謂的「美國世紀」面臨終結，牽動後續國際秩序的走向。

美國學者布蘭茲（Hal Brands）解析川普的第二任期對於國際秩序的可能影響，²他認為國際秩序變遷與歐亞大陸情勢息息相關，回顧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歸因於歐亞大陸出現新強權而導致衝突，進而引發國際秩序重新洗牌。二戰後，美國主導，以軍事衝突緩和、經濟發展優

¹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7, Post-Truth, Post-West, Post Order? accessed at: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17.pdf\)](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17.pdf) (2025/07/31)

² Hal Brands, "The Renegade Order: How Trump Wields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5, Published on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negade-order-trump-hal-brands#\(2025/08/0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negade-order-trump-hal-brands#(2025/08/05))

先，以及民主價值推廣為主的「自由國際秩序」。川普上台之後，種種以「美國優先」與「美國再度偉大」戰略思維下，目前國際政治正在回到「割喉式的權力政治」，來自威權國家的挑戰，包括俄羅斯、中國、伊朗及北韓，可以同時由區域地理中心及邊陲地帶來騷擾並尋求宰制歐亞大陸。

所以，《遠見》雜誌專訪加州大學教授萊克（David A. Lake）解析中美關係與國際制度新格局發展，他強調：「全球正處於一個權力轉移的過渡期，未來更可能是一個由多個強權共同領導的世界，而非回到美國一國獨大的舊秩序，或是進入由中國主導的新體系。」³亦即，當前的世界正處於一個國際秩序的「中間帶」：從以往一個穩定的霸權秩序，轉向一個尚未完全成型的新架構。

是以，由美國霸權主導下的「美國世紀」，以「權力」、「利益」為思考主軸的國際秩序，由於川普上台以來，面臨很多挑戰與新視野解析的必要性。本文嘗試從何為「國際秩序」？國際關係主流理論如何詮釋「國際秩序」，提出建構主義強調行為體之間有意義互動，創造共有知識，從而形塑彼此之間身份關係，以及相互之間利益與政策。其次，

³ 「川普 2.0 不只再度掀起美中競爭，更讓全球秩序進入重塑期」，遠見雜誌，<https://www.gvm.com.tw/article/121434>。

分析川普 1.0 以及川普 2.0 之後的種種戰略與政策的操作，如何進一步衝擊國際秩序的走向，以及未來台灣可能因應之道。

二、國際秩序的建構主義理解

（一）國際秩序的意涵

何謂「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或者「國際秩序」會受到何種因素影響而改變「秩序」？基於不同國際關係理論與學派，呈現不同狀態的「國際秩序」內涵與實踐方式。從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命題：國際社會處於一個「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高於國家主權以上的「太上政府」，是一個叢林社會，各自為己的生存狀態，所以，國家必須要靠自身能量，追求各項國家利益：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經濟財富與國際參與。

（二）傳統國際關係理論與學派立場

因此，主流的「現實主義」（realism）與「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學派基於「權力」（power）與「安全」（security）的角度，主張國家必須考量「相對利益」（relative advantage）概念，透過各種「硬權力」（hard power），主要軍事國防、經濟貿易力量，追求國家各種利益，達成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以及國際秩序的各種型態的穩定。

另外，也基於國際社會屬於無政府狀態，「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學派認為透過國際制度、規約與國際法，透過「相互依存」概念，追求國家之間的「絕對利益」（absolute advantage），更可以透過國際制度與合作，消除國家間的爭議，促進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發展。

事實上，從二次大戰之後，「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主導整體國際秩序的運作。首先 1949-1990 表現型態是美國與蘇聯領導的兩極集團對抗，互不往來，美國創建各種組織與制度，提供全球「公共財」，例如創建「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中，讓「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其他國家由於國際貿易和投資而累積的美元可以按 35 美元一盎司的價格從美國那裡兌換成黃金，此種貨幣安排為戰後世界經濟提供良好的保障。

另外，美國於 1995 年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基礎上，組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藉以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和規範化的國際組織，透過談判和規則執行，確保國際貿易的公平、可預測和穩定，從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發展。以及 1949 年成立「北約組織」（NATO），穩定世界安全體系。亦即，美國透過軍事同盟、自由貿易與多邊組織，打造一個以其價值觀為核心的全球體

系。⁴透過上述美國單極霸權治理下，華盛頓提供世界各國不同的公共財：「金融」、「貿易」與「安全」。

不過，美國軟權力國際關係理論代表學者奈伊（Joseph Nye）發表一篇「漫長美國世紀的終結：川普與美國力量的源泉」（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⁵，在文中奈伊特別強調美國不僅有「硬權力」（hard power），還有吸引與影響世界各國的「軟權力」（soft power），但是，奈伊指出於2025年4月2日，川普宣布對世界各國徵收「對等關稅」，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一方面，向美國貿易夥伴施壓，表明他相信當代的「相互依存」模式增強美國的實力，因為，其他國家依賴龐大的美國市場，以及確信美國軍事實力，賦予華盛頓對其夥伴施加高壓手段，但是，通過此種攻擊相互依存的模式，也削弱了美國實力的根基，自然也影響未來國際秩序的走向。

（三）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三種詮釋

⁴ 「川普 2.0 不只再度掀起美中競爭，更讓全球秩序進入重塑期」，遠見雜誌，<https://www.gvm.com.tw/article/121434>。

⁵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 July/August 2025, published on June 2, 2025, accessed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long-american-century-trump-keohane-nye\(2025/08/01\)](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long-american-century-trump-keohane-nye(2025/08/01))

第三個主流學派解釋國際秩序者為「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也同意國際社會呈現基本態勢：「無政府狀態」，但是，基於國家之間的不同互動態勢，可以創造三種不同主體位置的文化，包括：敵人(霍布斯文化)、競爭者(洛克文化)與朋友(康德文化)的「無政府狀態」。換言之，透過不同國家間不同「身份」的界定，影響彼此間的「利益」設定，以及後續國家之間互動的戰略與政策。在上述多種無政府文化形成過程中，每一個國家的「決策者」的戰略思維，主導了後續是否為敵人、競爭者與朋友的身份關係。

例如，冷戰時期，中國屬於前蘇聯集團，與美國領導的民主國家集團處於敵對關係，等到 1972 年尼克森總統嘗試在「權力平衡」思考下，運用「中國牌」來牽制前蘇聯，進而改變雙方互動方式，從「敵人」走向「競爭者」關係，建構關係正常化，簽署「上海公報」，從而改變美中「身份關係」與其下的「國家利益」。從冷戰、後冷戰、全球化，到現今「人工智慧」時代，基於不同時期的美國總統的戰略思維，界定安全威脅來源：敵人身份，從而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實現國家核心與主要利益。

三、川普 1.0 與 2.0 的國際治理實踐

(一) 「美國優先」下的國際戰略

2017年川普開展第一任時期，隨即宣布退出關於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取而代之《美國戶外活動法案》，並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談判，也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重新談判之後簽署《美墨加協定》。2018年針對美中貿易失衡議題，啟動美中貿易談判，於2019年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在智慧財產權、金融服務與農產品採購方面達成協議，中國方面同意採購400到50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美中雙方也就貨幣與匯率議題達成共識。

在對外政策方面，川普出售大規模武器給沙烏地阿拉伯，單方面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斡旋《亞伯拉罕協議》：開啟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一系列正常化協議，並從敘利亞北部撤出美軍，放任土耳其占領該地區，從而改變中東地區的戰略平衡。

此外，針對前總統歐巴馬參與包括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俄、英、法與德等六國與伊朗於2015年達成協議，限制伊朗發展核武器，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伊朗的制裁。但是，川普認為該協議很不合理，因為伊朗的彈道導彈項目、2025年以後的核活動以及在葉門和敘利亞衝突中的角色都沒有受到任何制約。於2018年，他決定退出美國參與的「伊朗核協議」，後來更下令暗殺伊朗革命衛隊領導人卡塞姆·蘇萊曼尼將軍，加劇了波斯灣的緊張局勢。

2020年2月29日，美國和塔利班武裝在卡達首都多哈簽署《為阿富汗帶來和平的協議》，其中提到美國和北約要從阿富汗撤出所有正規軍，塔利班承諾阻止蓋達組織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區活動，以及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之間會展開會談。之後，美軍決定在2020年和2021年從阿富汗撤出全部部隊，同時結束《自由哨兵行動》和北約的《堅定支持特派團》計畫。

在東亞部分，川普於2018年在新加坡、2019年在河內，以及同年稍晚參觀北韓非軍事區，成為首位踏上北韓領土的美國總統。於2018年的峰會上，美國與北韓簽署聯合聲明，承諾「努力實現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嘗試解決北韓核武試爆與發展飛彈問題。後來，雙方於2020年談判完全陷入停滯，北韓也恢復核武與飛彈測試，徹底讓朝鮮半島無核化回到原點。

（二）「美國再度偉大」下的全球戰略實踐

1. 單邊主義為主：2025年1月20日，川普正式就職第47任總統，開始推動「百日執政」成績單，單方面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揚言購買丹麥自治區格陵蘭島、更改墨西哥灣為美國灣、收回巴拿馬運河經營管理權、推動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等等。另外，為了處理伊朗核武設施與濃縮鈾工廠問題，6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下

令無預警空襲伊朗核武設施，此次行動名稱為「午夜重錘行動」（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為美國史上最大 B-2 轟炸機任務，以及首次實戰使用「巨型鑽地彈」。

2.以關稅手段達成經濟效益：4月初，川普援引《國家緊急狀態法》和《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宣布與邊境安全、非法移民和能源相關的多項「國家緊急狀態」。4月2日，川普公布全球關稅計劃，自4月5日起向全球所有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加徵10%的進口關稅，4月9日起向60個國家增加額外關稅，並且訂定7月9日為期限，要求相關迅速與美國會商貿易關稅事宜。7月初，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將對等關稅暫緩期延至8月1日，並陸續發出給多國領導人的關稅信函，通知8月1日起適用的新稅率。川普重申，「每發出一封關稅信，就是一項協議」，最好的協議就是直接寄出一封信，告知對方將支付的關稅，完全以美國利益為主，毫不尊重自由貿易秩序與國家主權。

3.交易式的協商：川普曾跨下海口，一天之內解決協調俄羅斯與烏克蘭停火協議，但是，莫斯科一直不予配合，持續加重對烏克蘭的空襲行動。是以，川普施壓軍事援助為理由，要求基輔簽署「礦藏協議」，擴大未來稀土開採，交換後續軍事武器援助事宜。以印度為例，要求莫迪減少跟俄羅斯購買原油，否則科以50%高額關稅抵制。另外，日本輸美商品被課徵15%的對等關稅，比4月2日公布之25%稅率低10個百

分點，不過附帶條件，日本將對美國投資 5500 億美元，並開放國內市場，包括汽車和卡車、稻米及其他農產品等貿易。韓國方面，建立規模為 3500 億美元的基金，鞏固兩國戰略產業合作基礎，助韓國企業進入美國造船、半導體、二次電池、生物和能源市場，換取跟日本一樣的 15% 的對等關稅。

4. 使用者付費角度：川普在第一任時即要求北約組織國家，提升國防預算，以及日本與南韓增加分攤美軍之駐軍費用。在第二任時期，再度要求北約國家提高國防預算，終於 2025 年海牙高峰會議，會員國承諾將國防與安全支出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5%，其中 3.5% 屬於核心國防支出，包括軍隊與武器等項目，其餘 1.5% 則可用於「與國防相關」的基礎建設。

5. 網路嘴砲心理戰：例如根據《路透社》報導，8 月 1 日，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警告川普，指稱俄羅斯擁有蘇聯時期遺留下的最終核打擊手段，隔天，8 月 2 日，川普透過社群媒體表示，鑑於上述這番「極具挑釁性」的發言，他已下令部署兩艘核潛艦，以防事態不只停留在口頭層面。事實上，川普此舉更多是言語層面的升溫，而非實質軍事行動，因為華盛頓的戰略核武三角之一的核動力潛艦經常處於秘密部署安排，隨時可以攻擊任何威脅美國本土的能量。

6.偏袒獨厚關係與國：川普一項支持以色列態度昭然若揭，在其第一任時以女婿庫奇納（Jared Corey Kushner）（猶太裔）為中東特使，於2020年9月，促成4個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達成所謂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並早在2018年促成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薩冷，表達支持其為以色列的永久首都。2023年10月7日爆發哈瑪斯恐怖主義攻擊以色列事件，華盛頓全力支持以色列的軍事掃蕩行動，其後，以色列國防軍佔領加薩走廊，「堅壁清野」的清光哈瑪斯人員，引發人道、難民與飢餓危機，也被世界多國指責以色列犯下「種族清洗」之罪，但是，川普基本上僅僅口頭譴責納坦雅胡政府，宣稱要成立糧食分配中心，也沒採取近一步行動壓迫以色列的加薩軍事佔領政策。

四、代結語：從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走向以川普意識為原則的國際秩序結

本文從何為「國際秩序」著手？提出國際關係主流理論如何從「權力」、「安全」與「利益」藉以詮釋「國際秩序」，點出非主流學派建構主義強調行為體之間有意義互動，創造共有知識，從而形塑彼此之間的身份關係，以及相互之間的利益與政策。在分析川普 1.0 以及川普 2.0 之後的種種戰略與政策的操作，了解過去以美國霸權穩定為主的，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提供全球國家的公共財：金融、經貿、安全等，代

之以川普「美國優先」與「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國際秩序，呈現舊有「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被破壞之際，川普獨夫號令下的美國秩序還在成型中，而以中國為首的金磚五國與新南方機制，目前還無法形成一股力量來抗衡川普，讓國際社會成員處於觀望態度之中。

其次，從建構主義角度分析川普 1.0 與 2.0 的國際戰略實踐，呈現一個複合式的多種無政府文化，基於川普的個人決策風格與意識形態，無法清楚區隔三種無政府文化的主體位置：「敵人」、「競爭者」與「朋友」之間的互動關係，亦即，對於川普而言，只要行為體的政策符合「美國優先」，是「敵人」，也是「競爭者」，也是「朋友」，只要違反「美國優先」，川普可以馬上改變無政府文化，改變與行為體的身份關係，從而調整戰略與政策。

未來，影響川普治理下的國際秩序發展，會受到三種因素的影響，第一，美國內部民意的反彈，是否會支持川普「行政權」獨大，國會無法制衡的現象。

第二，川普的全球「對等關稅」政策，由於過程不明確，協商不對等與倉促要求回應，讓全球經貿秩序動盪失衡之際，不僅影響各國產業發展動態，也因為增加關稅之後，未來各國出口至美國的各級產業製品，

勢必要加價才符合成本考量，勢必引發美國內部市場會面對一場通貨與物價膨脹時期。

第三，川普上台以來面對全球戰略的實際作為，除了單邊主義作為，以美國利益優先考量，朝三暮四、罔顧國際道義與他國相對利益，未來川普的任何美國內部與全球治理作為，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觀望與質疑，其他中等強國或是基於地緣戰略可以結合的區域國家，或許未來會結盟對抗單一霸權美國，藉以增加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安全。

最後，台灣也面臨以川普意識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持續在印太區域圍堵中國戰略，台灣成為地緣戰略的關鍵點，另外，台灣具有優勢的半導體與晶圓產業，在「美國製造」的大旗下，是否會被迫改變傳統產業結構？以及未來美中全球與區域戰略競爭下，美台兩方如何能夠持續有意義的互動，形成兩方之間的競爭者與朋友之間的無政府文化與身份，台灣必須「從長計議」與「審慎因應」，發揮如何能夠在兩大強權戰略競逐下的安身立命之道。

「美國川普治理下的國際秩序」：建構主義的角度

Abstract

Under Trump 2.0's "America First"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policies, the previously US-led,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ignificantly disrupted. Constructivism emphasizes that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haped not just by power distribution, but by shared ideas,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formed through state interactions. Trump's approach accelerates a shift from institutionalize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to cutthroat power politics, increasing mistrust and reshaping identity relations. For Taiwan, this entails proactively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nd norms aligned with its interests amid an un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defens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autonomy, and leveraging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build new security and supply chain frameworks. Taiwan's strategic autonomy goes beyond self-sufficiency; it requires actively cultivating multilayered consensus with all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through identity and interest alignment to navigate US-China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and the global order's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Trump's Governance, Global Order, Constructivism

要旨

トランプ 2.0 時代の「アメリカ・ファースト」および「アメリカを再び偉大に」の政策のもと、従来の米国主導による規則に基づく国際秩序は大きく揺らいでいる。構成主義は国際秩序が単なる権力配分ではなく、国家間の相互作用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る共有の観念、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利益によって形作られることを重視する。トランプ政権の政策は、多国間協力から権力闘争への転換を加速させ、不信感を高め、国家間アイデンティティ関係を再構築している。台湾にとっては、不安定な国際環境の中で、自国の利益に合致し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や規範を積極的に構築し、防衛や技術、経済の自立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多様な国際協力を活用して新たな安全保障およびサプライチェーン体制をつくる必要がある。台湾の戦略的自律とは自給自足を超え、同盟国や国際社会との多層的な合意形成を通じて国際的地位を高め、米中戦略対立と国際秩序の変容に対応すること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トランプ統治、世界秩序、構成主義

川普主義下的美歐關係：戰略依賴與戰略自主的十字路口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助理研究員 詹祥威博士

摘要

川普主義帶來美國對全球秩序的根本性重塑，促使歐洲由戰略依賴美國逐步走向強調「戰略自主」的新常態。在安全、經濟、科技等領域，歐洲追求減少對美依賴並提升自主能力。對於長期處於地緣風險中的臺灣而言，應警覺大國戰略動態變化對自身安全與國際地位之衝擊，「戰略自主」不等於完全自給自足，也並非脫離盟友，而是強化自一套符合本身利益的規範、制度、能力、產業佈局，並在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的過程中，加速自主國防能力、關鍵產業供應鏈與國際多邊關係的布局，維護臺灣安全與經濟永續。臺灣更應參照歐洲分歧經驗，正視內部矛盾、資源侷限，在區域安全架構下謀求彈性協作與多元夥伴，強化自身全球治理參與度，以因應未來大國競逐下不確定的新常態。

關鍵字：川普主義、美歐關係、戰略自主

一、前言

「川普主義 (Trumpism)」不僅是美國第 45、47 任總統川普個人哲思與政治立場的展現，更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版圖間、不同階層人群之間重新激盪與互動的深層現象。¹這種複雜的社會與政治變遷，對傳統由

¹ “Views of Trump: Personal Traits, Confidence on Issues, Ideology”, *Pew Research Centre*,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乃至於美國的跨大西洋關係構成了顯著挑戰。在此背景下，歐洲被迫重新審視其全球定位，並就應持續戰略依賴美國，抑或追求更大程度的戰略自主性，展開了激烈辯論，進而促使「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概念的激盪與深化。

本文主要在深入分析「川普主義」的本質及其對美歐關係的衝擊，並闡述「歐洲戰略自主」概念的演變與具體實踐。本文探討美歐關係從傳統「戰略互賴」走向「戰略自主」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可能的未來走向。這場轉變不僅是政策層面的調整，更是對全球秩序本質和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未來定位的根本性重塑。²

「川普主義」的興起與持續影響，源於美國社會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全球化對部分群體的衝擊、文化認同的焦慮，以及對傳統政治精英的不滿。此顯示川普主義不僅是對「歐巴馬路線」的反動，更是一種更為持久的美國全球參與模式的轉變。因此，歐洲無法僅僅期待美國外交政策「回歸常態」，而是必須認知並適應美國全球參與可能發生的長期性調整，這使得追求戰略自主成為一種結構性的必要。

本文標題之「十字路口」亦非指一單一的、決定性的選擇時刻，而是反映歐洲戰略方向持續不斷的重新評估過程。歐洲內部持續針對戰略

<https://shorturl.at/pHrKa>, November 22, 2024.

² 關於「美國傳統保守主義」，請參閱：Mark C. Henrie,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ist Conservatism”, in *Varieties of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edited by Peter Berkowitz, October 2004, pp. 1-30.

依賴或戰略自主展開激烈辯論，且戰略自主的概念本身也經歷了快速演變。顯示歐洲的戰略轉型是一個動態的、持續適應的過程，而非一次性的二元選擇。理解這種持續的戰略再評估，有助於避免將歐洲的選擇簡化為非此即彼的「虛假兩難」。

二、川普主義的定義與核心特點

「川普主義」的定義超越了單一政治人物的哲思，它融合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工業主義，並被許多人視為對歐巴馬時期所謂「進步（Progressivism）」與「覺醒（Wokeism）」的反動。儘管絕大多數美國人可能將川普視為「保守主義者」，但「美國傳統保守主義者（Traditional American Conservatism）」則認為，川普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存在顯著差異。³

綜整而言，「川普主義」的核心大致坐落於反移民與文化保守、經濟民族主義與貿易保護、反全球化與美國優先等特點。這意味著其從歐巴馬時期的「開放門戶全球化」轉向「反多邊」立場，並以雙邊談判為主的「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它反對「全球主義（Globalism）」與「搭便車（Free-Rider）」行為，強調重新審視並優先美國利益。

³ “Understanding Trumpism: Nationalism, Populism, and Industrialism”, *Baron Public Affairs*, <https://shorturl.at/ydJ2i>, Spring 2017.

這種對美國「右翼意識形態」的重新定義，具有深遠的長期外交政策影響。如果川普主義代表一種新的、獨特的意識形態，將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置於傳統保守主義的自由市場和國際主義原則之上，那麼其外交政策表現，如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交易關係等，就可能更為根深蒂固，不易逆轉，即使在川普卸任後也可能持續存在。這使歐洲認識到，川普主義帶來的挑戰可能不是暫時的偏差，而是美國外交政策更為永久性轉變的指標。這促使歐洲必須進行長期的戰略調整，而非僅僅等待美國回歸到前川普時期的規範。

「美國優先」政策不僅僅是單邊主義的偏好，更是一種對現有全球秩序的蓄意、系統性全面檢視，旨在瓦解其基礎規則和機構。這表明川普主義不僅僅是改變特定政策，無論是貿易關稅或條約退出，而是從根本上挑戰二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規範和制度基礎。透過質疑共同的全球責任和多邊合作的益處等核心原則，川普主義試圖將國際交往的本質從合作的、基於規則的體系重新定義為交易性的、零和的競爭。這種影響超越了即時的政策干擾，深入侵蝕了歷史上支撐跨大西洋合作的共享價值觀和原則。這促使歐洲不僅要尋求替代夥伴，還要積極倡導和強化多邊秩序本身，將自身定位為全球治理規範的捍衛者。

三、歐洲戰略自主的概念

冷戰後，美國以舉國之力推行協助民主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以金援等方式協助戰後歐洲的民主、民生站穩

腳步，最終形塑了「舒曼計畫（Schuman Plan）」、「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逐步走向「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Coal and Iron Community and the Common Market）」與後續經濟及政治統合的「歐盟」。⁴在戰後百廢待舉的時空背景，「歐洲一體化」無論在經貿、金融，政治乃至於安全防衛上，皆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實際能成功亦歸功於美國。

基本戰後美—歐關係建立在兩大支柱：傳統的盟邦價值與現實的利益價值之上。所謂「傳統盟邦價值（Traditional Alliance-Based Approach）」，意旨基於前述戰後復興，包含雙邊在共享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基礎上，發展出的政治、經濟與安全伙伴關係。其中的實際體現，包含安全上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全球治理，乃至於全球反恐等層面。

所謂「現實利益價值（Pragmatic Interest-Based Approach）」，則實際體現在如經貿互動關係上的「歐盟—美國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he 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與當前仍持續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⁴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The Marshall Plan (1947)”, AIT, <https://shorturl.at/eNxak>, 2017.

Partnership, TTIP) 」等；以及美國的支持，換取歐洲各國在國際事務上的支持與協助。

如同所有國家，美歐間關係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無論在前述經貿、全球治理，乃至於反恐、安全事務、數位主權，甚至能源自主等綜合多樣議題上，基於各方利益與價值，美歐皆有各自立場與堅持，不僅使前述經貿合作的 TTIP 的談判持續延宕甚至擱置，亦因而出現所謂「歐洲自主」概念。

歐洲「戰略自主」概念，常被誤解為獨立、單邊主義，甚至有時是帶封閉性的自給自足；然，此詞語有其特定含義。正如其希臘語詞源所示，「自主」意味著「自我」（autos）能夠依循「自身法則」（nomos）而活。這並不必然意味著獨立，亦非單邊主義或自給自足，乃是依循自身法律、規則和規範，並非一定單獨行動，但仍隨時準備在必要時獨立行動；理論上，一個自主的歐盟，能夠透過自身力量保護規範與防範威脅，並在以自身塑造的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進行多邊合作。

「戰略自主」的概念在歐盟政策圈中經歷了快速演變：從最初側重於防禦，⁵擴展到更廣泛的安全考量，例如經濟、技術，乃至於當前 AI 等新興科技等。歐洲在整體非國家行為者所形塑的挑戰日益嚴峻的同時，

⁵ Josep Borrell, “Why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Matters”, *EEAS*, <https://shorturl.at/pS6rL>, March 12, 2020.

基礎科技與工藝、競爭力和尖端技術方面的風險日益增加，尤其是在量子計算、先進半導體等軍民兩用技術領域。

這項概念的政治和政策重要性日益突出，是對歐盟內部發展和國際體系變化的回應。歐盟從「單一市場」發展為經濟、貨幣同盟，如今形成擁有共同的價值、經濟、司法乃至於安全防衛領域，以及萌芽中的一致性外交政策。在外部，國際體系的快速轉變，以及以價值觀乃至於宗教差異導致的安全威脅，使得歐洲戰略自主成為誘人選項以及必要。

四、川普單邊主義作為之衝擊

表：川普主義與美國傳統保守主義的主要特徵比較

特徵類別	美國傳統保守主義	川普主義
核心理念	有限政府、自由市場、個人自由、傳統價值	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反全球主義、威權傾向
經濟政策	自由市場、減稅、財政紀律	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補貼國內產業、供應鏈回流
貿易政策	自由貿易、多邊貿易協定（如 NAFTA、TPP）	雙邊談判、懲罰性關稅、貿易逆差視為損失
移民政策	歷史上較開放，強調合法移民和同化	反移民、限制移民、邊境築牆、本土主義
外交政策	國際主義、全球領導、聯盟體系（如北約）	美國優先、交易性外交、單邊主義、質疑聯盟價值
多邊主義	堅定支持多邊機構（如聯合國、WTO、北約）	傾向退出或削弱多邊機構、偏好雙邊關係
政府角色	限制政府干預、維護法治	擴大總統權力、政府積極干預（以推動傳統道德、打擊「覺醒主義」、保護產業）
文化立場	社會保守主義（通常在文化議題上較少干預）	文化保守主義、反「覺醒主義」、強調傳統價值、針對少數族裔的言論
領導風格	制度化、外交導向	個人化、不可預測、直接訴諸民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整繪製。

戰後美歐跨大西洋關係建立在兩大支柱之上：傳統的盟邦價值和現實的利益價值。所謂「傳統盟邦價值（Traditional Alliance-Based Approach）」源於冷戰大戰略，即美國為歐洲和亞洲夥伴提供安全保護，並在開放的世界經濟中開放美國市場、技術和供應的準入。作為回報，這些國家成為可靠的夥伴，為美國領導的西方戰後秩序，乃至全球秩序提供外交、經濟和後勤支持。其實際體現包含安全上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全球治理，乃至於全球反恐等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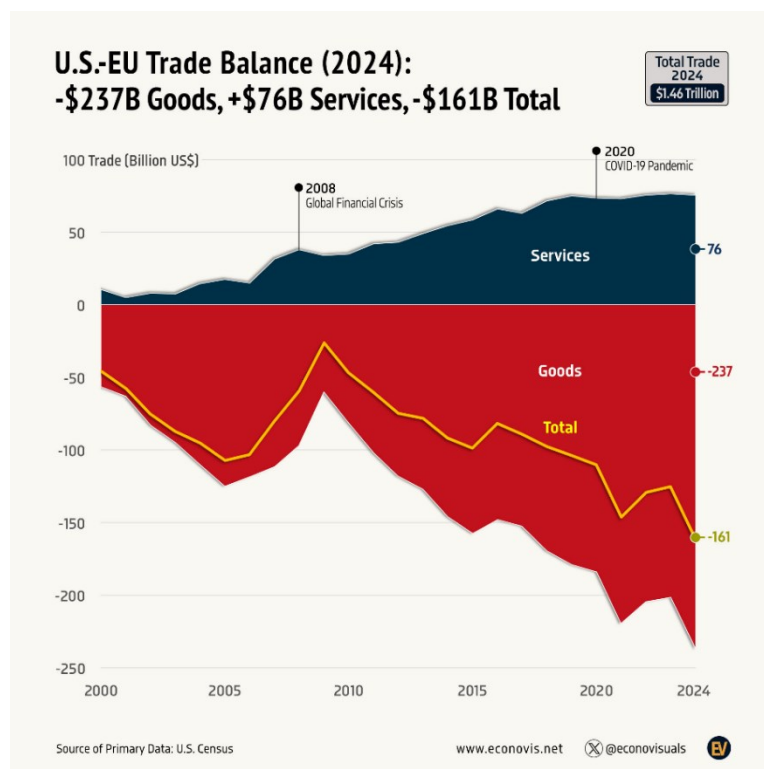
其次，「現實利益價值（Pragmatic Interest-Based Approach）」則體現在經貿互動關係上，例如「歐盟—美國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和仍在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基本而言美國的支持換取歐洲各國在國際事務上的支持與協助。

歷史上，歐盟對美國保持著顯著的貿易順差，2024 年的商品貿易順差達到 2356 億美元，即便計入 760 億美元的服務項目貿易順差，雙邊貿易差額仍達 1600 餘億美元，而此走向係為戰後常態。歐盟對美國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機械和車輛（佔出口的 41%）以及化學品（27%），⁶這突顯了這些項目在跨大西洋貿易關係中的戰略重要性，即便貿易顯示美國

⁶ “USA-EU -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Statistics”, *EUROSTAT*, <https://shorturl.at/1b29M>, March 2026.

和歐洲間深厚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以及巨大的貿易量、整合的供應鏈等複雜的相互網絡，但同時也引發「川普主義者」批評歐洲長期依靠美國的安全保護，卻同時「賺走美元」，然而在全球事務又時常與美國不同調的看法。

戰後美國基於「理想主義」所創造的全球治理與多邊架構，如北約、聯合國，乃至於「世界貿易組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等。傳統的美國外交政策，包括歐巴馬政府時期，始終傾向於利用和加強各種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或多邊機制。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是刻意建立在多邊機構框架之上，此些機構為美國



圖：美歐雙邊貿易關係。來源：Econovis。

「全球治理」提供規範和運作基礎，促進共同的政治利益，推動海外自由化以實現共同繁榮和穩定。很大程度這些機制與機構，都以美國為主要出資維護者，但也相對以美國規則為主要優先運作基礎。

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在全球諸多國家皆有正面與負面影響，在主要提倡者美國內部亦是如此，包含失業率、傳統產業衝擊乃至於移民與對基督文化的衝擊等。在此國內議題加劇下，川普的「美國優先」主要落實在安全同盟與全球經濟兩大層面；⁷在「安全同盟」層次上，美國不僅維護歐洲、第一島鏈的安全，防範非民主主義的擴散與侵犯，但美國卻同時為此些安排主要出資維護。在經貿上，如前述美國在對外貿易中，對中國和墨西哥乃至於歐洲長期產生大額逆差，因而加劇國內議題的不滿轉移。

有基於此，「川普主義」具體的體現，主要呈現在退出多邊機制、國際事務不再提供免費便車，以及重振美國核心價值。

在川普領導下的美國，系統性地退出了關鍵的國際協議和機構，包括《巴黎氣候協定》、中程飛彈條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並宣布打算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⁷ Aaron Blake, “Donald Trump’s Strategy in Three Words: ‘Americanism, Not Globalism’”,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shorturl.at/PxA9o>, July 22, 2016.

(WHO)。這一系列退出行動，標誌著在處理全球公共產品問題上與歐洲存在深刻的意識形態分歧。

川普政府停止向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提供財政捐助，解散了國務院全球變遷辦公室，並明確計劃廢除國際貿易規則，這被視為預示著「WTO 的死訊」。川普關於國際環境協議的行政命令明確指出，其政府的政策是將美國利益放在首位，此類協議「不得過度或不公平地加重美國負擔」。

川普政府對多邊主義的系統性破壞，導致了全球治理體系碎片化，並在應對氣候變遷、公共衛生和貿易等全球挑戰方面造成了領導真空。這種碎片化不僅增加國際合作的複雜與成本，也促使歐洲尋求替代的合作模式和更強的戰略自主。更甚，川普政府對歐洲主要自由社會的「文明盟友」地位提出質疑，特別是副總統 J.D. Vance 在 2025 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對歐洲領導層的尖銳批評，指責歐洲偏離其民主價值觀並與美國政策背道而馳，「美國優先」原則和其對民主制度的挑戰，在歐洲內部引發了對其自身民主韌性的擔憂。

五、歐洲戰略自主之發展

法、德作為歐洲經濟大國，是「歐洲戰略自主」的主要倡導者，包含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以及德國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馬克宏作為歐洲戰略自主的堅定倡導者，其多次將

川普的政策比喻為「電擊 (electroshock)」，認為這是喚醒歐洲擺脫「戰略依賴」睡夢的機會；他呼籲歐洲應建立共同防禦，即便在美國不參與的情況下也能採取行動。⁸而在川普第一任期時梅克爾也曾表示，歐洲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再完全依賴美國。⁹儘管德國在實踐上相對謹慎，但其內部對減少對特定國家經濟依賴的討論日益增多，尤其是在對中政策方面。

總體而言，最初的歐洲戰略自主，主要指歐盟在不嚴重依賴美國的情況下，維護歐洲安全並在周邊地區採取軍事行動的能力。然而，在川普第一任時期所產生的貿易摩擦、武漢肺炎疫情所導致全球供應鏈中斷，以及對新興關鍵技術的依賴等，促使「歐洲自主」擴及到諸多其他層面並且加大了此概念的討論與激盪，包含：

- 經濟自主：減少對外部供應鏈的過度依賴，特別是關鍵原材料如稀土和戰略性產業。
- 數位與科技主權：減少對美國科技巨頭和中國技術的依賴，發展歐洲本土的數位基礎設施和技術標準，確保數據安全和數位服務的獨立性。
- 能源自主：降低對單一能源供應商如俄羅斯的依賴，加速發展再生能源。

⁸ Clea Caulcutt, "Trump's Return is an 'Electroshock' for Europe, Says Macron", *Politico*, <https://shorturl.at/UlhI9>, February 14, 2025.

⁹ "Merkel: Europe 'Can No Longer Rely on Allies' After Trump and Brexit", *BBC*, <https://shorturl.at/jLbWn>, May 28, 2017.

- 健康自主：肺炎疫情凸顯醫療物資和藥品供應鏈的脆弱性，歐洲開始思考在健康領域的自主能力。

具體行動與倡議，則包含歐盟內部啟動了歐洲防務基金（European Defence Fund, EDF）、永久性結構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等計畫，旨在提升歐洲的國防能力和互操作性。在經濟層面上，歐洲近年提出「負責任的去風險化（De-risking）」，亦即在經濟和貿易領域不再強調全面「脫鉤」，而是評估並採取「去風險化」策略，旨在減少對特定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過度依賴，但非完全切斷聯繫，這包括審查外國投資、強化供應鏈韌性、推動關鍵技術的本土化等。至於在新興科技與數位標準部分，歐盟在相關領域推出了一系列法規，如《通用數據保護條例 GDPR》、《數位服務法 DSA》、《數位市場法 DMA》等，旨在確立歐洲的數位標準和原則，避免被「外部科技巨頭」主導。

實際上如前述，「戰略自主」之概念並非川普後才有之現象，早在2000年後歐洲即有各項計畫體現了某種程度的「獨立行動」，包含2004年的協助喬志亞加強法治化與司法系統合作的 EUJUST Themis，2007年共同協助阿富汗警政與司法改革的 EUPOL Afghanistan，以及2008年歐盟共同安全與國防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下派出的最大規模民事特派團支持科索沃法治機構正常化任務的 EULEX

Kosovo 等。這些任務雖然未直接以「戰略自主」為名，但反映了歐盟在安全防禦領域的自主努力。¹⁰

2016 年「歐盟全球戰略 (EU Global Strategy)」的制定是戰略自主概念的重要體現，將其正式納入歐盟的安全防禦政策。¹¹ 2016 年 11 月的歐盟理事會結論進一步定義了「戰略自主」的含義，顯示政策層面的承諾，並且在隨後幾年亦多次提及「戰略自主」的重要。對於「戰略自主」行動的具體施行，包含 2017 年啟動為期兩年的歐盟防禦研究準備行動 (Preparatory Action on Defence Research)。

在安全與防務方面，歐盟的「重整歐洲計畫/2030 年準備計畫」(ReArm Europe Plan/Readiness 2030) 是這一轉變的核心。該計畫提議由歐盟共同出資超過 8,600 億美元用於軍事投資，其中約 1,600 億美元為歐盟支持的貸款。過去，美國國防公司佔歐盟國防採購約三分之二，現在面臨由這些貸款資助的國防採購中，規範 65% 必須來自歐盟、挪威或烏克蘭境內，將對美國國防產業產生一定衝擊效益。例如，德國已將停止運作的福斯汽車廠和鐵路車輛廠改造為坦克生產設施。歐洲在應對烏克蘭危機方面，投入資金業已超過美國，自 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已花費近 1,500 億歐元其中包括 508 億歐元的對烏直接軍事援助。當

¹⁰ Ricardo Farinha, “The EU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Moving Away From Democracy Support”, *Carnegie Europe*, <https://shorturl.at/8hVVe>, March 4, 2025.

¹¹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EU*, <https://shorturl.at/6XcTk>, June 2016

前歐洲國家正嘗試確保境內能夠擴大生產、調整供應鏈、減少破碎化和競爭，並開發新的、更具彈性化的共同生產和採購模式。

在經濟方面，歐盟正在從傳統的開放、自由主義方法轉向優先與價值觀相似的國家建立「選擇性夥伴關係」，強調主權和防止受外國影響。這項新戰略還透過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措施來倡導更大的自給自足，包括「回收、創新和研究，對國內加工和製造能力的定向財政支持，以及建立備用和儲備」。儘管美國仍是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但川普政府的外交和貿易政策，以及歐盟自身「去風險化」戰略的實施，直接的挑戰了過去的既定路線。歐盟的「去風險化」戰略旨在減少對外部力量在關鍵領域，如安全、經濟和技術的過度依賴。

在科技領域，歐洲的戰略自主不僅關乎武器製造，還包括使其能力得以實現的演算法、數據和網路。川普顯然嘗試利用美國科技、技術做為地緣政治槓桿，此點加深了歐洲的不安。歐洲則相對設法減少對美國在新興科技與安全技術方面的依賴。例如，歐洲正開發一獨立的類似星鏈的衛星星座，名為「韌性、互聯互通和安全衛星基礎設施（IRIS²）」，並預計於 2027 年部署，它將與已經運行的伽利略（Galileo）全球定位系統替代方案和哥白尼（Copernicus）氣候觀測系統相結合。

歐洲在安全、經濟和科技領域採取這些務實步驟，不僅是為了應對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更是為了在長期內重塑其全球角色。這些行動旨

在減少對外部力量的依賴，提升自身的戰略能力，並在一個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維護其利益和價值觀。這代表著歐洲從戰略依賴到更為主動的全球參與者的深刻轉變，其影響將遠超單純的防務開支，觸及其工業基礎、技術創新和全球治理模式。

六、川普路線與戰略自主的互動

在總體而言，川普的貿易政策，表面上旨在糾正貿易不平衡，但實質上是一種地緣政治工具，旨在施加影響力並戰略性地重塑全球供應鏈。這種做法迫使歐洲不僅要捍衛其眼前的經濟利益，還要戰略性地重新評估自身的工業基礎和供應鏈韌性，加速向「去風險化」和本地化生產轉變，從而改變全球經濟整合的本質。這種「美國優先」的政策不僅僅是單邊主義的偏好，更是一種對現有全球秩序的蓄意、系統性「駭入」，旨在瓦解其基礎規則和機構。

當前，川普政府實施 1930 年代以來最高的關稅，目前針對 100 多個國家徵收關稅，正式結束了近 80 年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時期。美國平均關稅稅率已從 2016 年的 1.5% 攀升至目前的 8.4%，如果川普兌現所有威脅，可能達到 18%；對歐洲而言，川普威脅對歐盟商品徵收 50% 關稅，包括對法國香檳、葡萄酒和其他歐洲烈酒徵收 200% 的關稅威脅。這些措施使 9.5 兆美元的跨大西洋年度經貿關係處於震盪之中。

在安全防務方面，北約集體防禦的第五條款作為跨大西洋安全架構的核心，規定「對一個或多個盟國的武裝攻擊應視為對所有盟國的攻擊」。這一集體防禦原則自 1949 年以來一直是北約的基石，唯一一次正式啟動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之後。而川普則多次對成員的國家防禦支出水準始終不滿，雖曾嚴厲批判，但川普終究成功推動北約盟友增加國防開支。最近期北約峰會達成協議，承諾到 2035 年將國防支出提高到各國的 GDP 的 5%，這一發展被白宮譽為「里程碑式的勝利」，並被川普本人稱為「每個人的巨大勝利」。¹²

即便成功維繫北約持續運作，但川普強勢、單邊主義的作為，仍為美歐關係蒙上陰影。包含歐洲對美國信任及「可預測性」的示警，觀察者認為美國政策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導致歐洲對華盛頓的信任度降低。此外，歐洲擔心美國可能從歐洲「安全事務」中脫離，尤其是在俄烏戰爭背景下，迫使歐洲在「尚未準備好」以前獨立承擔更多防禦責任；而在貿易壁壘與經濟民族主義下，川普重整關稅與供應鏈的單邊強勢作為，可能直接導致雙邊貿易額下降，進而影響歐洲經濟穩定。

雖然「戰略自主」聲音始終存在，但當前大多數歐洲國家仍認為北約是歐洲集體防禦的基石，美國在軍事能力、情報共享和核威懾方面的作用難以取代；尤其是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美國的軍事援助和領導作

¹² Jonathan Beale, “Trump says Nato defence spend rising to 5% of GDP is 'big win' for US and the West”, BBC, <https://shorturl.at/zyRGJ>, June 24, 2025.

用更顯關鍵。再者，短期內歐洲各國在國防開支上仍難以達到北約的目標，且軍事能力與美國仍存在巨大差距，短期內難以完全獨立承擔所有防禦責任。

而歐盟內部成員國的意見更難達成一致，法國和部分南歐國家更傾向於推動強大的歐洲防務合作，而中東歐國家，如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則更擔心俄羅斯的威脅，認為美國和北約的安全承諾依然不可或缺，對過度強調「戰略自主」可能削弱北約保持警惕。因此較為實際的途徑歐洲，歐洲或會採行「開放性戰略自主」等更為彈性的概念，暗示這並非意味著完全的「自給自足」。¹³

而在經濟層面上，美歐戰後長期複雜互賴、供應鏈關係與相互貿易，考量經濟成本與實際層面，歐盟當前主要採行路徑包含擺脫對特定國家（如中國）的高度依賴，但此點涉及巨大的投資和產業結構調整，成員國乃至企業擔憂其成本和可行性。此外，此經貿涉及市場準入與全球化，歐洲經濟高度依賴全球貿易，過度強調自主可能導致貿易壁壘增加，影響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七、代結語

¹³ Kristi Raik, Marcin Terlikowski, Dr. Mario Baumann, “Beyond Burden Sharing: Conceptualizing the European Pillar of NATO”,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shorturl.at/5pa8W>, Jun 17, 2025.

總體而言，當前歐洲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在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以及川普「美國優先」政策持續推進的背景下，歐洲應該繼續爭取並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還是應該追求更大程度的戰略自主？

而從前述綜整與分析當前發展趨勢，最可能的途徑是採取的是一種「混合路徑」——亦即歐洲既不完全切斷與美國的聯繫，也不完全依賴美國。具體的實踐包含，安全領域增強自主能力，提高國防支出並加速發展歐洲國防工業，建立更加獨立的軍事能力；同時在經濟領域減少對美依賴，投資更多資源加強、加速歐洲內部市場整合，並大力發展與其他地區的經濟關係；在政治層面則保持靈活性，根據具體議題和情況，評估自身利益選擇與美國合作或獨立行動，而此路線卻也正是反恐戰爭後飽受美國批判的選擇性扞從。

因此，可以想見此種轉變不會一帆風順。其整體挑戰包含歐洲內部各國的分歧、整體有限資源的限制與挑戰，以及對美國安全保障的長期依賴慣性，都將成為實現戰略自主的重大障礙。

更準確地說，美歐關係當前正走向一條根本性轉變道路，從傳統的「戰略互賴」轉變為更具獨立性的現實互動模式。顯然川普的強硬風格，反而強化了歐洲現在迫切希望維持現有的聯盟，並確保美國繼續作為歐洲安全的保障者，但在政治、外交又希望維繫自主特性，因此可以預見對美國而言，歐洲的重要性被在未來的戰略思惟將持續降低。

而美歐之間的「新常態」，其特點不僅是歐洲在安全、經濟和外交政策上擁有更大的自主權，更代表雙方在全球治理、全球經貿乃至於即便在共同安全議題上，將會有更多的意見相左甚至衝突。可以預見美國會採取更具選擇性和交易性的全球參與方式，標示著從傳統夥伴關係向更為獨立但仍相互關聯的互動模式的演變，而雙方在此互動有機動態過程中都進行根本性與結構性的調整。

歐洲亦不再將美國的承諾視為理所當然，並將加速積極塑造自身安全與繁榮的未來；而美國則在更具選擇性的基礎上，重新定義其全球參與。這場轉變不僅是政策層面的調整，更是對全球秩序本質和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未來定位的根本性重塑。

川普主義下的美歐關係：戰略依賴與戰略自主的 十字路口

Abstract

Trumpism has driven the US to fundamentally reshape the global order, prompting Europe to move from strategic dependence toward a new norm of “strategic autonomy” across security,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omains. For Taiwan—long exposed to geopolitical risks—this underscores the need to be keenly aware of how great power shifts affect its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anding. “Strategic autonomy” for Taiwan does not signify total self-sufficiency or severing alliances; rather, it means strengthening an internally coherent set of norms,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al capacities that serve Taiwan’s interests. With the US pivoting its strategic focus toward the Indo-Pacific, Taiwan should accelerate its defence capabilities, secur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and proactively participate in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iwan should also learn from Europe’s internal divergences: address domestic contradictions, recognise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seek cooperative flexibility within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reby increasing its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adapting to an uncertain new normal und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Keywords: Trumpism、US–EU Relations、Strategic Autonomy

要旨

トランプ主義は米国のグローバル秩序再構築を加速させ、欧州に安全保障・経済・技術分野での「戦略的自律」への転換を促しています。地政学的リスク下にある台湾にとって、本稿は「戦略的自律」が単なる自給自足や同盟からの分離ではなく、自国の利益に適った規範・制度・能力・産業基盤を強化することの重要性を示唆しています。米国がインド太平洋への戦略重心を移す中で、台湾は自主的国防力や重要産業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多国間協力体制の強化を急ぐべきです。また、欧州内部の意見の相違から学び、国内矛盾や資源の限界に直面しつつ、柔軟な協力体制と多角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を追求することで、地域安保と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における台湾の存在感を高め、不確実な時代に対応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す。

キーワード：トランプイズム、米 EU 関係、戦略的自律性

美國與東亞關係：戰略聯盟 VS 戰術抵銷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研究員

秦嗣葵

摘要

2025 年東亞局勢快速變動，美國以 AUKUS、QUAD 等多邊安全及科技聯盟圍堵中國，同時強調經濟與科技自主，美國加大盟友軍費分擔與經貿壓力，東亞戰略聯盟穩定性面臨挑戰。中俄合作加強、區域安全壓力上升，臺灣在區域安全網絡中扮演關鍵。美國「美國優先」外交不確定性提升，突顯臺灣需提升自身國防、科技自主、關鍵產業與供應鏈安全能力，善用多邊合作，同時強化因應大國競合的靈活戰略，以追求戰略自主，化被動為主動。

關鍵字：戰略聯盟 戰術抵銷 戰略自主

一、前言

2025 年，東亞地緣政治格局進入劇烈動盪與重組的關鍵時刻。美國作為全球霸權，長期以來透過戰略聯盟鞏固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並以多層次的安全、經濟與科技合作網絡，對抗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然

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區域國家自主性增強，以及美國內外政策變動，東亞的戰略聯盟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戰術抵銷壓力。本文將從戰略聯盟與戰術抵銷的雙重視角，系統分析美東亞關係的現狀、挑戰與未來趨勢。

二、戰略聯盟的現代樣貌

戰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指的是國家間基於長期共同利益與價值觀，透過政治、軍事、經濟等多層面合作，建立穩固且制度化的合作關係，以共同應對區域或全球安全挑戰，維護共同戰略目標。在東亞，美國與日本、南韓、澳洲等民主國家所組成的安全與經濟聯盟，是典型的戰略聯盟，這些聯盟不僅強調軍事合作，也涵蓋價值觀的認同與制度性連結。

1. 美日韓三邊同盟的深化與困境

「美日韓三邊同盟」是美國維繫東亞安全秩序的核心。2023-2024 年間，拜登政府積極推動三邊安全合作，強化情報共享、飛彈防禦與聯合軍演，並在經濟安全領域展開協作，意圖形成類似「小北約」式的多邊安全架構。

2025 年，三國領導人均陷入國內政治危機：美國總統川普接任，推動關稅戰，日本首相石破茂維持親美政策受影響。南韓因總統尹錫悅遭

彈劾下台，新任總統李在明不隨從美國反中政策，可能觸碰川普紅線，皆為美日韓同盟未來合作投下變數。

2. AUKUS、QUAD 與多邊安全網絡

AUKUS（美英澳安全夥伴關係）與 QUAD（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這兩個架構雖功能不同，卻共同體現出美國圍堵中國、強化印太戰略聯盟的核心邏輯。2025 年川普再度當選總統後，其外交政策風格也影響這些機制變化。

由於該些多邊機制不僅針對中國，也兼顧北韓、俄羅斯等潛在威脅，形成「同盟網路化」的新趨勢。

AUKUS 與 QUAD 是美國因應中國崛起、重塑印太秩序的雙軌戰略工具。川普再任後雖維持對抗中國的整體戰略目標，但其外交策略更趨交易化與單邊化，川普政府也有釋出重新評估相關多邊機制功能與作用的資訊。未來這兩大機制的穩定與效能將取決於各國能否在不確定的美國政策下建立更強的協調與共識。對於印太地區而言，這是一場不只關乎軍事部署，更關乎制度信任與地緣政治平衡的長期競局。

3. 經濟與科技聯盟

近年來，美國為應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迅速崛起，積極推動以自身為核心的「經濟與科技聯盟」，其戰略重點包括晶片產業的聯合布局、關鍵供應鏈的重組，以及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美國試圖聯合日本、韓國、台灣、荷蘭等擁有先進製造與技術優勢的國家，共同建立技術與資源的戰略聯防體系，藉此在半導體、人工智慧、5G、量子運算等領域對中國形成「科技圍堵」與「戰略包圍」，拜登與川普兩任美國總統均強調重振美國製造業與科技主導地位的企圖，也強化與亞洲科技強權的合作關係。

然而，在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主導下，華府對盟友的期待與壓力也同步升高。美國要求日、韓提高軍費分擔，並對盟國出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使原本基於共同戰略利益建立的合作機制，逐漸暴露出矛盾。韓國與日本對美國外交政策均表達憂心不滿，也影響合作穩定性。趨勢顯示，美國雖仍為主導力量，但其聯盟關係需兼顧雙邊利益與多邊信任，否則其經濟與科技聯盟的穩固性將難以長期維持。

美國為強化印太地區對中戰略聯盟的效能，積極協助盟國推動軍事現代化，涵蓋情報共享、飛彈防禦與無人系統合作等關鍵領域，提升整體聯合作戰與嚇阻能力。在經濟安全方面，美方致力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特別是在半導體與關鍵原材料領域，協調日韓台等科技強國建立更為穩固的產業鏈體系。同時，透過建立聯合指揮體系與常設特遣部

隊，美國希望在區域危機發生時具備更高的快速應對與聯合作戰能力，進一步提升聯盟的危機管理效能。

參、戰術抵銷的多重表現

戰術抵銷（Tactical Offset）是指在戰略框架下，針對對手的優勢或威脅，採取具體且靈活的軍事、經濟或外交手段，力圖在局部或短期內削弱對方影響力或能力，以達到平衡或牽制效果。這種抵銷不一定建立在長期合作基礎上，而是根據當前態勢調整策略與行動，常見於軍事技術競賽、經濟制裁、灰色地帶行動等。

1. 中國的分化與反制策略

在面對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聯盟與日益強化的地緣圍堵情勢下，中國採取一套多層次、具靈活、有針對性的「戰術抵銷」策略，來削弱美國主導東亞秩序的地位。首先，在政治與外交層面上，中國積極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利用韓國政權更迭與外交立場的搖擺、以及日韓長期存在的歷史與領土爭端，巧妙地挑動日韓矛盾，分化弱化美日韓三邊安全架構凝聚力。另外，透過中日韓元首峰會、經貿對話與文化交流，以此削弱美國主導的區域安全論述。

其次，在經濟層面上，中國也實施具針對性的反制作為，對美國及其盟友進行出口管制與供應鏈干擾，特別針對稀土、半導體材料等關鍵

戰略資源。這些作法不僅能突顯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關鍵角色，實質上也對美方的圍堵政策產生作用。此外，中國強化與東協國家、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成員國的經貿關係，推動「中國+東協」供應鏈合作，力圖建構一個區別西方歐美國家的經濟圈層，以牽制美國主導的經濟安全聯盟。

另在軍事層面，中國強化「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軍事戰略部署，提升其在東海、南海及台海的軍事存在與機動性，持續軍事演習、艦機聯合巡航，展現其軍事肌肉。這些作為不僅對美國形成戰略壓力，也讓周邊盟國面臨更高的軍事風險與安全成本。透過這類軍事武力威懾展示，中國希望強化其在第一島鏈內的戰略主動權，並進一步反制美國聯盟體系在印太區域的軍事整合與前沿部署。

綜合上述，中國的分化與反制策略正以多重維度逐步削弱美國所謂「印太圍堵網」的實效，構成區域博弈中不容忽視的實力。

2. 俄羅斯、北韓與「多頭牽制」

俄羅斯與北韓地緣政治傳統上為中國在戰略博弈中的兩大重要夥伴，向來共同對美國與其盟友的資源與注意力構成消耗壓力。

對俄羅斯而言，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俄國雖深陷戰場泥淖，卻與中國在地緣安全上逐漸形成更緊密的合作格局。在東北亞方向，中俄透

過聯合軍演、情報合作與外交聲援等方式，加強對美國主導秩序的戰略牽制。間接有利於中國在台海或南海等敏感區域獲得更大活動空間。

其次，北韓向來是東亞地區一個高度不確定且具有戰略干擾力的因素。2025 年以來，北韓持續進行多次導彈試射與核武展示，成功吸引美日韓三邊聯盟的注意與軍事部署。尤其在北韓核武發展與遠程導彈能力提升，已能對關島、美國本土甚至太平洋地區美軍基地構成直接威脅，迫使美國必須強化東北亞軍事部署，進一步分散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壓力。

俄羅斯與北韓在區域安全中扮演「戰略干擾者」角色，透過挑起危機、拉高緊張情勢，有效牽制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與資源集中。對中國而言，這種牽制有助於營造其在第一島鏈與南海的行動自由度，削弱美國圍堵能力效能。

3. 東亞區域國家自主性提升

在美中地緣戰略對抗加劇的背景下，多數亞太區域內國家不再單純依附於任何一方大國，反而積極尋求外交自主性，來避免捲入大國衝突。尤其東協國家展現出強烈的平衡意識，在中美兩強之間採取靈活而務實的外交策略。例如南海主權爭議，部分成員國與中國存在領土爭議，但東協整體仍未明確倒向美國，反而支持推動區域內部對話機制與多邊合作。此外東協亦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與中國的經貿連結，但同時也與美日進行合作。

而日本與南韓近年來在經濟、科技與外交政策上也出現更多自主傾向。在半導體供應鏈重組、對中科技出口管制等議題上，日韓兩國是根據本國產業利益與區域穩定考量進行調整，而非全然扞從美國的政策。

整體而言，亞太各國逐步強化自身在區域戰略中的主體自主性，用以增加外交談判的靈活性與籌碼，客觀上對美國主導的安全聯盟機制產生一定程度的戰術抵銷效果。推斷未來這種趨勢將進一步使印太地區的權力結構趨向多極化，美中競爭的戰略對抗在區域層面將變得更加複雜。

中國在面對美國主導的戰略聯盟體系時，運用多重戰術試圖加以抵銷，雖有成效，但亦伴隨風險與侷限。例如，中國試圖分化美日韓聯盟，但由於北韓威脅與中國崛起帶來的區域安全壓力，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反而更趨緊密。此外，中國反制美國及盟國的經濟反制，如限制關鍵原料、稀土的出口，雖在短期內造成供應鏈干擾，但也更促使美國加速推進「去中國化」政策，亦間接強化美國操作「中國威脅論」的論述。此外中國不斷強化其軍事能力，包括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部署，固然對美國形成戰略壓力，卻也同時升高區域軍備競賽與衝突誤判的風險。上述情況使得美中之間的權力影響競逐情況更顯複雜。

肆、代結語-未來的發展與挑戰

美國未來的東亞戰略中，將持續推動聯盟的網絡化與多元化，深化與日本、南韓、澳洲及印度等國的多邊安全合作，並將聯盟觸角擴展至

經濟、科技與產業鏈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強化整體韌性與圍堵中國的布局。同時，為因應日益升高的地緣政治風險，美方必須建立更完善的危機管理與聯合指揮體系，以降低誤判與衝突升級的可能性。然而，美國更必須調整其對盟友的政策與態度，在強化合作的同時尊重盟友自主性與國家利益，避免因過度施壓而導致聯盟裂痕與失去信任。

中國同時也將持續發展其「戰術抵銷」策略，透過經濟誘因、外交分化與軍事威懾等多手段來削弱美國的同盟體系。然而，在北韓威脅、俄烏戰爭等共同安全議題驅動下，美日韓等國的安全合作應將只有更為緊密，中國的分化策略效果將有限。在經濟層面，中美在科技、供應鏈與關鍵原材料領域的競爭日益白熱化，雙方皆試圖在全球市場中爭奪鞏固地位，將促使區域國家加快科技自主與多邊合作。軍事方面則因對抗升溫而使區域誤判與衝突風險上升，危機溝通與風險控管機制的重要性日趨重要。

在此動態博弈中，台灣將扮演關鍵的戰略角色。雖然 2025 年美國國防戰略將台灣定位為「非生存性利益」，但美防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論壇的演講顯示，防止中國主導亞洲仍是美國戰略重點之一，美方將會持續對台軍售與技術合作。而對台灣而言，除了強化自主防衛能力，更需積極融入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架構，以減緩經濟依賴單一市場的風險並用以爭取更多國際支持。總體而言，2025 年的美東亞關係是處於戰略聯

盟與戰術抵銷的激烈角力之中，如何維持東亞區域穩定並防止衝突升高，是美中與東亞各國的重大安全挑戰。

美國與東亞關係：戰略聯盟 VS 戰術抵銷

Abstract

Amid rapid changes in the East Asian landscape in 2025, the US utilizes multilateral security and tech alliances such as AUKUS and QUAD to contain China, while drivi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sufficiency. However, rising US demands on allies regarding defense sharing and trade create tensions, threatening alliance stability. Strengthening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and growing regional security pressures highlight Taiwan's pivotal role.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US's "America First" diplomacy means Taiwan must enhance its defense, technological autonomy,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leverag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adopt a flexible, proactive strategy for strategic autonomy amid grow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Keywords : Strategic Alliance 、 Tactical Offset 、 Strategic Autonomy

要旨

2025年、東アジアの地政学は急激な変動期に入り、米国は AUKUS や QUAD などの多国間安全保障・テクノロジー同盟を通じて中国を牽制すると同時に、経済・技術の自立化を進めています。しかし、同盟国への防衛費負担や経済圧力の増大は、同盟安定性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ます。中露協力の深化や安全保障リスクの高まりの中、台湾は地域安全保障ネットワークで重要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ます。米国の「アメリカ・ファースト」外交の不確実性が増す中、台湾は自国防衛力・技術自立性・重要産業や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安全性を高め、柔軟かつ多元的な戦略で主体的な戦略的自律を追求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キーワード：戦略的同盟、戦術的抵消、戦略的自律

川普 2.0 時期美中戰略競逐下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挑戰與抉擇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研究顧問 陳振良博士

摘要

在美中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持續加劇的時代，臺灣面臨外部壓力與內部抉擇的雙重挑戰。美國推動對中「去風險化」與供應鏈重組，持續強化與台灣在安全與科技領域的合作；同時中國崛起推動以自身為中心的新秩序，對台壓力與風險升高。此情勢下，臺灣必須積極推動戰略自主，包括多元化國際合作、提升國防與經濟韌性、發展自主科技與產業，亦需強化危機應對能量，確保在美中競爭長期變局中維持最大的自主空間與安全保障，降低受單一大國政策波動影響的風險。

關鍵字：霸權轉移、戰略對峙、戰略自主

一、前言

美中關係的互動呈現出當前國際關係中的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的複雜性。隨著中共的快速經濟成長，已形成對美國的國際政經地位構成挑戰，特別是 2025 年川普回任後對中共政策產生重要轉變，川普於 4 月 2 日美國「解放日」提出無差別「對等關稅」說明，相較的 7 月 4 日美國「獨立紀念日」，美中兩國提出相互放寬經貿禁止與管制措施，川普還

提出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互訪的訊息，美中關係本質上存在於「相互競爭、有限合作、長期對抗」基調未變，顯見美中雙方競逐下已存在於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的變化，是值得探討議題。

二、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的意涵與關係

1. 霸權轉移緣起與意涵

霸權轉移（Power Transition）又稱權力轉移的概念源自於 20 世紀中葉的國際關係研究，主要用來解釋國際體系中強權更替時期所引發的衝突與戰爭。由美國政治學家奧根斯基（A.F.K. Organski）於 1958 年出版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首度提出，該理論認為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並非靜態，而是隨著國家間的實力變化而動態調整。當一個國家的實力接近現有霸權國家時，若該國對現狀不滿意，則可能會導致衝突或戰爭的爆發。特別是，認為國際衝突的主要來源不是權力平衡失衡，而是霸權轉移期間的挑戰者與主導國的衝突。換言之，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如美國）會因新興強權（如中共）的崛起而遭受到挑戰，導致權力從既有霸主手中轉移出去的過程可能引發衝突。

2. 戰略對峙緣起與意涵

戰略對峙（strategic confrontation）的概念是源自於冷戰時期軍事與國際關係學術領域的概念，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美蘇冷戰

時期。兩個超級強權（美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上相互競爭，形成全球兩大陣營的對抗。換言之，戰略對峙強調大國之間在核武與軍力平衡下，彼此無法輕易動武，但也無法建立穩定合作關係的持續對立狀態。

3. 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的關聯性

霸權轉移是國際互動的趨勢，戰略對峙是手段或運用的過程。如果崛起國挑戰現有霸權國的地位與秩序安排，往往會引發戰略對峙。當前美中關係可以被理解為：中共崛起帶動霸權轉移趨勢，而美國則透過戰略對峙企圖延緩、管控及阻止這一轉移過程。顯見美中關係產生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的聯動性。

三、美中關係下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的觀察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並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事實上，隨著中共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軍事實力的提升，中共逐漸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換言之，中共的崛起不僅在經濟上影響全球市場，還在政治和軍事上對美國的影響力構成威脅。

1. 霸權轉移：中共崛起與美國對抗

霸權轉移理論說明當一個新興大國的國力接近或超越既有霸權，雙方的競爭與衝突將升高，可能引發戰爭。由於美中關係競逐下美國因中共崛起而受到威脅與挑戰，導致權力從既有手中轉移出去的過程可能引發國際衝突。

(一)中共崛起：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經濟、軍事、科技與國際影響力等多方面快速發展，逐漸由區域性大國轉變為全球性強權，對現行國際秩序造成深遠衝擊與戰略過程。就如 2025 年 7 月 4 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的「大而美」法案，預計在 10 年內為國家增加約 3.3 兆美元的債務。相較的，從中共角度來看，川普行事風格善變，使得「大而美」法案將不會讓美國經濟成長，反而讓美國更接近財政懸崖，是值得關注議題。

(二)美國對抗：美國推動「去中化 (De-risking / Decoupling from China)」，是指自川普 2.0 時期以來，為因應中共崛起對其經濟安全、科技優勢與國際秩序的挑戰，透過政策、法律、聯盟合作等手段，降低對中共的依賴並限制其關鍵領域的發展。這一戰略已延續至前拜登政府，並轉化為更務實的「去風險化」政策。如美國重組印太聯盟、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如晶片禁令）、增加對台軍售。相較的，中共認為崛起最好時機可能會導致「修昔底德陷阱」局面，可能試圖挑戰現有國際秩序，進一步導致國際衝突擴大。

2. 戰略對峙：共存與對抗競爭態勢並存

戰略對峙概念指兩個或多個大國之間在核心利益上高度對立，彼此視對方為長期競爭者，採取遏制、防衛、賽局理論等戰略作為。因此戰略對峙下霸權不必然轉移，而是強調美中兩個強權在經濟、科技、軍事與價值體系等方面長期競爭與對抗的共存的態勢。

（一）經濟競爭：中美經濟戰是指美國與中國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為了爭奪全球經濟主導權、技術優勢與戰略資源，展開競爭與對抗態勢。這場經濟戰不只是單純的貿易衝突，更是地緣戰略競爭的延伸。2025年4月中美兩國互相加徵大幅「報復性」關稅，美國對中共進口商品加徵145%的關稅，中共則對部分美國商品課徵125%關稅。雙方在談判後，同意將關稅分別降至30%與10%，以便繼續磋商。同年6月，兩國宣布已就稀土材料出口與科技管制放寬等議題達成共識，隱含著調降關稅在於雙邊無意加劇衝突。

（二）軍事對抗：中美軍事對抗是當代國際政治較重要性的戰略對峙之一，主要存在於亞太地區（尤其是台海、南海、東海）穩定性，涉及軍力部署、戰略威懾、技術競賽與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對抗。換言之，軍事對抗已從傳統軍事對峙，延伸至網路空間、太空領域與人工智慧武器發展。因此軍事對抗是多層次的戰略競爭，涵蓋軍備競賽、區域部署、軍演對峙、灰色地帶衝突等。不過美中雙方都不願輕啟戰端，卻在維持

霸權地位與區域主導權上寸步不讓，這種軍事對抗存在與發展將是值得關注議題。

（三）意識形態競爭：中美意識形態競爭是當代全球地緣政治對抗的一個核心面向，體現於政治制度、價值觀、治理模式與全球話語權的激化對立。這場競爭不僅影響雙邊關係，更在全球範圍內影響制度選擇與陣營分化，尤其在「民主對威權統治」的論述架構下更加白熱化。美國強調民主自由、人權問題（如新疆、香港），相較的，中共則主張「國家主權優先」、「中國式現代化」的有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中美兩國長期存在於意識形態的競爭態勢。

（四）多邊機制對峙：中美多邊機制對峙，是指美國與中共在國際與區域多邊組織、合作架構、聯盟體系的多邊架構下進行影響力與主導權的結構性競爭。這種戰略對峙並不僅是外交競逐，更反映出兩國在全球治理模式、地緣戰略、經濟秩序上的根本分歧。就如美國拉攏印太夥伴關係，中共則強化金磚國家結盟、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建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等全球的經濟整合與影響力擴展。顯見美中兩國如何透過不同機制平台擴張影響力、爭奪主導權，以爭取有利戰略對峙的局面。

四、代結語-未來的挑戰與抉擇

可預見未來，川普 2.0 時期美中關係可能形成兩個不同經濟和政治體系。這種趨勢可能會導致國際秩序的重組，並影響全球貿易、科技合作及安全架構。因此，美中關係也將形成以下不同面向的戰略競逐的態勢。

首先是建立競爭與對峙模式：川普 2.0 時期以來美中關係呈現出「戰略競爭、經濟脫鉤」的主軸，但在國際局勢變遷（如烏俄戰爭、以伊衝突、台海緊張）和國內民意推動下，呈現出更強硬、更具對抗性的趨勢。相較的隨著中共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已逐步擺脫過去「韜光養晦」的戰略，積極擴張其在全球的影響力，從區域性大國邁向全球性強權，成為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主要挑戰者。預判未來美中兩國可能同時呈現中共崛起下霸權轉移的趨勢與美國長期競爭戰略對峙的局面。

其次是進入新的冷戰時期：新的冷戰時期相較於冷戰時期美蘇對抗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特別是川普 2.0 時期以來形成關稅戰延續與擴大、鼓勵製造業回流與反對製造外包、推動關鍵產業回美（如半導體、藥品、稀土資源）、減少對中共依賴與鼓勵科技與資金撤出等面向，形成「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新冷戰態勢，對於長期存在於中美高度經濟互賴構成挑戰與不確定性。

最後是形成戰爭衝突風險的可能：台海、東海或南海若出現誤判或軍事升溫，將加速從對峙走向衝突甚至於將形成美中霸權轉移的嚴重後

果。特別是臺灣能否在美中競逐下加強戰略縱深與具前瞻性的國安規劃，避免局勢失控，確保自身安全與區域穩定。

總之，霸權移轉與戰略對峙下的當前國際關係中不可忽視的現象。雖然美中目前處於高度競爭狀態，雙方仍傾向不會達到激烈對抗手段進行對抗。隨著中共的崛起和美國的國力逐漸衰退，未來的國際秩序將面臨重大的挑戰和變革。如何管控風險，避免衝突，區域穩定將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

川普 2.0 時期美中戰略競逐下霸權轉移與戰略對峙挑戰與抉擇

Abstract

As US-China hegemonic transition and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intensify, Taiwan faces the dual challenge of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ternal choices. The US advances “de-risking” from China and restructures supply chains, deepening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Simultaneously, China’s rise drives a new order centered on itself, increasing coercion and risks for Taiwan. In this landscape, Taiwan must pursue strategic autonomy by diversify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strengthening defense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developing independent technology and industries, and enhancing crisis management. This ensures that, amid prolonged US-China rivalry, Taiwan maximizes its autonomy and security, minimizing vulnerability to policy fluctuations of any one major power.

Keywords: Power Transition、Strategic Confrontation、Strategic Autonomy

要旨

米中覇権移行と戦略的対立が激化する中、台湾は外部からの圧力と内部の決断という二重の課題に直面しています。米国は対中「リスク回避」や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再編を進め、台湾との安全保障・ハイテク協力を強化。一方、中国は自身主導の新秩序を推進し、台湾への圧力とリスクを高めています。この状況下で、台湾は国防・経済の強靱化、自主技術や産業の発展、多様な国際協力、危機管理能力の強化を通じて戦略的自律を追求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これにより、米中競争が長期化する中でも最大限の自律性と安全保障を確保し、特定大国の政策変動によるリスクを最小限に抑え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ります。

キーワード：覇権移行、戦略的対立、戦略的自律

美臺戰略前沿與戰術牽制：國際秩序重整下的 臺灣戰略自主

臺灣戰略研究學會 研究員 曾尹亮

摘要

本研究以孔恩的典範轉移理論為視角，指出傳統臺美安全關係框架正面臨新挑戰。在國際秩序重整、川普「交易型」外交與中國戰略壓力下，臺灣必須強化戰略自主性，以因應高度不確定的安全環境。戰略自主需從重新定位臺美關係著手，建立以經貿、科技與區域安全為三大支柱的策略，並朝多邊參與以及嵌入國際制度方向發展。

關鍵字：戰略前沿、戰術牽制、戰略自主

一、前言

長期以來，臺灣在國際地緣政治上被視為美國對抗中國的「戰略前沿」，也是東亞棋盤上用來「戰術牽制」中國的棋子。然而，2025年全球三大地緣政治勢力交匯於臺灣，在此國際秩序出現重整跡象的時空條件下，探討美臺關係現況下的「戰略前沿」與「戰術牽制」角色觀點，並以孔恩（T.S. Kuhn）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視角重新審視臺美關係，提供臺灣在變動的國際格局中確立戰略自主方向。

二、美臺關係現況

(一) 「戰略前沿」：美中競爭最前線的民主堡壘

台灣被視為美國印太戰略中「戰略前沿」的核心原因在於其無可取代的地緣戰略位置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價值、以及科技實力。

1、第一島鏈核心位置

臺灣位處第一島鏈的中心，控扼西太平洋與南海之間的重要航道，是全球海運貿易及國際航線的輻輳要道，具備重要地緣戰略價值。

2、民主典範與多邊治理合作

台灣展現出民主治理優勢，彰顯民主治理及抗衡威權壓迫的經驗，形塑出「亞洲民主燈塔」，證明民主體制的韌性與效率，符合普世價值觀。

3、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技術重鎮

台灣半導體等戰略科技優勢，「矽盾」位居全球關鍵地位，因此技術能力的「轉移」、「分散」成為美國戰略布局之首要考量。

(二) 「戰術牽制」：大國博弈中的策略運用

從美、中趨於白熱化的大國競爭下，臺灣成為美國「圍堵」(Containment) 中國軍力東擴下，強化西太平洋軍事布局棋盤的棋子。

1、美、中競爭框架下的附屬地位

美國對兩岸均不保證明確軍事承諾，可視為雙重平衡的戰略模糊策略，既不助長分裂，也威懾對岸武力冒進，確保台海維持現況。

2、遏制中國的工具性角色

美盟正在重新調整戰略優先事項，如：日本將「台海有事」與自身安全連結，美軍在菲律賓預先部署中程飛彈發射系統並規劃重啟太平洋島嶼基地等。台灣在建軍備戰上則建構「多域拒止、韌性防衛」的資產，提升不對稱與韌性防衛能力。

三、未來國際格局的結構

(一) 臺美關係重新定位：在川普第二任期的「交易型」外交政策下，臺灣可能需要從以往依賴美國的「戰略模糊」轉向更主動的角色，以科技優勢啟動多邊合作的自信，強化與美國的對等關係，以滿足盟友實質利益換取支持與維護臺灣自身利益。

(二) 中國的安全秩序觀：《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白皮書強調「雙循環」的安全戰略，穩定國內治理與國際秩序，於 2035 年前在「變亂交織的世界」之下，採取先內部安全治理，再處理主權，最後強化國際影響力的「先安內再攘外」步驟，做為處理兩岸政策中的體系化戰略考量與隱性路徑。

(三) 北約的戰略聯動：「大西洋與太平洋戰略聯動」點名臺灣為關鍵角色，顯示臺灣成為全球供應鏈與區域安全的關鍵節點，在全球安全的重要性提升。但北約對中國的態度相對謹慎，希望既保持良好的經濟關係，又能求取價值觀和人權問題上的平衡。

(四) 不確定性與挑戰：川普政策的不可預測性、中國對臺施壓以及全球地緣政治與歐、俄關係的複雜性，臺灣需要服膺國內共識的自主平衡，並以更靈活、敏捷的方式強化國際合作。

四、典範轉移視角下的臺美關係重定位

(一) 既有典範的挑戰

孔恩的典範轉移理論認為，當既有框架無法解決新興問題時，需改變思維框架以適應新現實。當前臺美關係透過《臺灣關係法》提供非正式安全保障的傳統框架。然而，川普強調以美國利益優先，傾向以雙邊談判取代多邊框架的「交易型」外交政策，要求臺灣在經貿及晶片做出

更多讓步，以及將國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以換取「戰略模糊」的安全承諾。另外，在美中競爭、區域安全壓力與供應鏈重組，更暴露出臺美關係中「單一依賴」的風險。

（二）從「受」到「施」的新典範

面對未來十年的國際新局，臺灣需從「受」美國安全保護轉向主動藉由自身科技強項，塑造「施」予全球的角色來升級臺美關係。另，北約的「大西洋與太平洋戰略聯動」構想中，首次將臺灣視為「樞紐」的深層意義是要確保兩岸關係維持現狀或降低中國對臺動武的意願，以斷除俄羅斯入侵歐洲的機會，促使臺灣的角色從區域擴展至全球。具體策略包括：

1、多邊化臺美關係：以經貿、科技、區域安全做為臺灣戰略自主三支柱，透由北約的「大西洋與太平洋戰略聯動」框架，重點性地參與歐洲、印太地區的多邊安全與經濟合作機制，以分散對美單邊依賴。

2、整合經貿槓桿：在地緣政治策應下，臺灣以原「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的基礎，需要擴大「科技業智慧化」的產業聯盟和整合資源，以多元布局全球供應鏈融入國際、開發新興市場，利用產業優勢確保戰略互利。

3、軟實力外交：透過文化、科技與民主價值輸出，推廣臺灣的民主經驗與科技創新，吸引國際支持，進而強化臺灣在國際社會的「不可替代性」。例如，「打造臺日韓民主金三角」為主體架構，深化與澳、紐等國的多邊合作，成為新典範下的全球安全與經貿網絡關鍵節點。

（三）典範轉移的挑戰與機遇

1、挑戰：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可能導致美國對臺支持的不確定性，臺灣內部政治分歧，影響國防自主與抗壓能力。同時，中國軍力持續擴張且對臺強硬立場，以及國際機構組織架構與國際規則的限制，壓縮臺灣參與國際的空間。

2、機遇：北約的戰略轉向為臺灣提供了融入全球安全架構以及擴大與歐洲國家合作的機會，提升臺灣在地區多邊安全與經濟合作機制的能見度。臺灣的半導體與科技優勢也使其在全球供應鏈中具有獨特地位，可作為談判籌碼。

五、結語

在川普「交易型」外交、中國「安全秩序觀」與北約「大西洋與太平洋戰略聯動」的國際格局下，透過典範轉移理論來看臺灣對外關係，從被動依賴美國轉向主動塑造臺美關係之外，我們更要以「全新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將有限的資源分配更多的比例到歐洲。所以，臺灣需把握

國際格局變動契機，從過去美國印太戰略下，對中國所扮演戰略前沿以及戰術牽制共軍的角色，重新以戰略自主的立場出發，將經貿、科技與區域安全做為臺灣戰略自主的三個支柱，利用半導體、AI與自主國防作為支點，透過多邊聯盟與全球標準制定作為槓桿，靈活外交與社會韌性作為施力點，實現 2035 年的永續發展目標。如此，臺灣不僅能在動盪的國際秩序中立足，更能成為全球安全與經濟網絡的關鍵節點。

美臺戰略前沿與戰術牽制：國際秩序重整下的 臺灣戰略自主

Abstract

Drawing on Thomas Kuhn’s theory of paradigm shift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governing U.S.–Taiwan security relations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within the old paradigm. In a rapidly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mark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merica First”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and growing strategic pressure from China—Taiwan must strengthen its strategic autonomy to navigate an increasingly uncertain security environment. Achieving this autonomy requires fundamentally redefining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through a three-pronged strategy focused on economic and trade resili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Central to this approach is expanded multilateral engagement and deeper integration in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hich together enhance Taiwan’s standing in the evolving global order.

Keywords: Strategic Frontier 、 Tactical Containment 、 Strategic Autonomy

要旨

クーンのパラダイム転換理論の視点から、従来の米台安全保障関係の枠組みが新たな課題に直面している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いる。国際秩序が変動する中で、トランプ政権の「アメリカ第一」を掲げる取引志向の外交と中国による戦略的圧力を背景に、台湾は不確実性の高まる安全保障環境に対処するため戦略的自律性を強化する必要がある。戦略的自律を達成するには、米台関係の再定位を起点とし、経済・貿易、技術、地域安全保障の三本柱からなる戦略を構築す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る。この戦略は多国間の枠組みへの積極的参加と国際制度への組み込みも志向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戦略的前線、戦術的牽制、戦略的自律

兩岸關係的戰略自主與戰略溝通

臺灣戰略學會理事、淡江大學戰略所兼任助理教授 曾怡碩

摘要

臺灣的戰略自主，長期受美國的地緣政治觀所牽動。冷戰時期，美國藉由臺灣地位未定論與台海中線，維繫臺灣相對中國大陸的自主性；後續的「一中政策」亦堅持兩岸議題須和平解決，形同賦予臺灣在特定框架下的戰略自主。與此同時，北京透過「一國兩制」等戰略溝通，試圖固守其對台事務的自主性。然而，臺灣在民主化後，其內部對國家路線的分歧，使一致性的戰略溝通變得複雜。面對「川普 2.0」時代，臺灣必須透過更精準的戰略溝通向各方傳達明確訊號，以在強權競逐下確保臺灣的自主選項與戰略利益。

關鍵字：兩岸關係、戰略自主、戰略溝通

一、前言—台美中三角關係下談戰略自主

臺灣能否走戰略自主的路線，最醒目也最隱晦的指標就是兩岸關係。和世界上許多冷戰時期在自由陣營的國家一樣，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互動也受美國的區域秩序與地緣政治觀所牽動，臺灣地位未定論以及韓戰以來美軍劃定的台海中線都被視為冷戰時期美國力求維繫臺灣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戰略自主性。美中建交後的一中政策亦復如此，面對當時兩

岸政權均非民主政體，美國的兩岸政策一貫堅持兩岸未來由人民自主決定，兩岸議題必須和平解決，讓兩岸關係形同被美國賦權下的戰略自主，兩岸關係從而經常性由台美中三角關係視角看待與處理。

二、中共勉力維持的對台戰略自主性

中共在與美建交之前，就不斷透過戰略溝通對華府與台北表達其對臺灣的姿態。間斷性的作為包括金門砲戰與九六年台海危機，這乃是北京對美國分別表達拒止外力干預兩岸事務的戰略溝通，只不過前者是警告外力不得助蔣反攻武統，後者則是警惕台獨莫指望外力介入。持續性的樣態則是北京領導班子對台的叫囂或溫情喊話，而從葉九條發展定型的一國兩制成為對台政策定海神針，並在 2020 年強頒香港國安法造成一國兩制號召力徹底崩壞之前，持續近四十載形成中共對內、對台、對外足以固守兩岸相對於美國的戰略自主性的戰略溝通論述。

三、臺灣從一致轉為斷裂的兩岸關係自主性

民主轉型前的臺灣對於兩岸關係的操作一直是安全依附美國而則對中汲汲營營謀求情感與經貿的貼近。但臺灣在民主轉型後重新檢視並挑戰一國兩制，強調臺灣擁有的自主性早已超越一國兩制所能施捨的恩惠，香港淪為只有一國而無兩制更讓中共這張牌在臺灣人眼中徹底失去價值。臺灣的分裂社會也讓一致性的戰略溝通趨於複雜，當一部分人希望依附美國以謀取相對於中共的戰略自主性，另一部分人則寄希望於中共的強

勢姿態、甚至作為，藉此維繫臺灣在美中兩強之間的戰略空間，更讓臺灣的兩岸關係政策自主性趨於辯證關係。

四、結語

川普 2.0 之下雖對中國大陸持續脫鉤斷鏈，但面對中共根本質疑華府助長台獨力道，臺灣在美國幾輪「棄台論」強烈訊號下，由賴清德總統親自上陣於受訪時拋出公司併購說，精準傳達兩岸統一的選項依舊存在無疑，也讓北京無法順手在 2025 年美中關稅談判中打交易臺灣這張牌。如此顯見美國對台海戰略模糊路線近年雖調整趨向戰術清晰，戰略模糊路線迄今未曾遭受根本性的轉變。循此路線邏輯，近期可預見在川普改造全球政經秩序之下，中共雖藉由一再重申聯合國安理會 2758 號決議乃為一中原則背書，美國勢將質疑如此將覆滅臺灣人民選擇獨立的空間，進而持續採取反制作為。

兩岸關係的戰略自主與戰略溝通

Abstract

Taiwan's strategic autonomy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the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U.S. maintained Taiwan's autonomy relative to mainland China through concepts like its undetermined status and the median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subsequent "One China Policy" also insisted on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effectively granting Taiwan strategic autonomy within a specific framework. Concurrently, Beijing has attempted to secure its own autonomy in Taiwanese affairs through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uch a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However, following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its internal divisions over the national path have complicated cohes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Facing the "Trump 2.0" era, Taiwan must convey clear signals to all parties through more precis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to ensure its autonomous options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amids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Keywords : Cross-Strait Relations 、 Strategic Autonomy 、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要旨

台湾の戦略的自律性は、長らく米国の地政学的観点に影響されてきた。冷戦時代、米国は台湾の地位未定論や台湾海峡の中間線を通じて、中国大陸に対する台湾の相対的な自律性を維持した。その後の「一つの中国政策」も兩岸問題の平和的解決を堅持し、台湾に特定の枠組み内での戦略的自律性を事実上付与した。同時に、北京政府は「一国二制度」などの戦略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通じて、台湾問題における自らの自律性を確保しようと試みてきた。しかし、台湾の民主化後、国家路線に関する内部の対立が、一貫した戦略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複雑にしている。「トランプ2.0」時代に直面し、台湾はよりの確な戦略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通じて各方面に明確なシグナルを送り、大国間の競争の中で自律的な選択肢と戦略的利益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キーワード：兩岸関係、戦略的自律、戦略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

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由前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榮譽教授翁明賢，於 2006 年創立之國家安全、戰略、防衛事務等綜合性研究學會；其宗旨在於藉由廣納民間相關領域之研究人員，成為台灣具影響力的研究智庫，並與中國、美國、歐洲、日本、韓國及東南亞著名研究組織與智庫進行交流對話，成為區域具影響力之智庫。現任學會理事長為東吳大學政治系、台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李黎明。

The Taiwan Strategic Research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by Ming-Hsien Wong,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dvisor and honorary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It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stitute focus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defence affairs. Its mission is to gather researchers from various fields in civil society to become an influential think tank in Taiwan, engaging in dialogue and exchange with prominent research organisations and think tank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Japan, South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thereby becoming a regionally influential think tank.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is Li-Ming Lee,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Taipei.



發行人 臺灣戰略研究
學會理事長 李黎明